

吾师虽离去,恩绪永缅怀

二月河

我与冯其庸先生交往历史,现在很多读者都知道了。其实当年初次给冯先生写信时,我只是隐约的知道他是一位著名学者,究竟他在哪里工作,是什么职务,我一概是不了解的。

我当年在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,部里订阅了全国很多杂志,有数十种的样子罢。为了寻找一个出版或写作门路,我把这些杂志全部摆放在长条桌上,依次一本一本地审视分析,最终我选中了《红楼梦学刊》。

我其实本就未打算终身泡在“红楼”这个学界里造出什么新的红学论点的。人生成功之路分成“硬着陆”和“软着陆”两种形式。像各位老师同学一步一步从小学走到大学毕业,沿着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,叫“软着陆”;像我这样没有这个条件坐在高空飞机上,也不用降落伞,眼一闭跳下去,叫“硬着陆”。我的这种思维后来在几所大学里讲课时表述得很清楚:我想借用《红楼梦》这个平台实现自己“硬着陆”的梦想。第一,我在初高中时便喜读《红楼

梦》对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形象有一些纯读者的观察和思考,对这部书的结构和构思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,写这类文章觉得不至于太费劲。第二,在当时,文革结束不久,按我当时的想法:老一辈红学家因对文革心存疑惧,未必能放得开写红楼论文,而新一代的红学新人有一个成熟的过程,这个杂志处的时期比较特殊。第三,《红楼梦学刊》是一本贵族杂志,一般读者不易投稿成功。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多是大学老师,至少也是讲师。发表出文章容易为社会注目,杂志影响大,作者在社会上也就会有更大的读者群。在文革结束新时代诞生之时,这本杂志可能起到社会桥梁作用——事情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。

刊物定下来了,寄给谁?我依旧一片茫然。看了看刊物编委单子,除了李希凡,一个也不晓得,再仔细一点,发现编委里头有“常务”,常务编委名字的肩头划着一个“*”字花——这就是个标志。带“*”字花的常委里,头一个便是冯其庸,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了。我当时考虑过李希凡,但我认为他可能是学刊的领导或学会的行政干部,未必管着这些事务,而这时想起来了冯其庸的文名是极高的,同时也是什么大学的教授。当时什么也不懂,坐在办公室里充分发挥想象力——稿子投给谁,更能引起重视,能更快地出来面世是第一位的事。冯其庸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。

这里的描述还是慌乱了一点。应该说在确定《红楼梦学刊》为主攻方向之后,我立即将手头的一篇红学文章寄了出去。但半年过去了,既没有见到退稿,也没有回信,更不见稿子有发出的迹象。这时确认了冯其庸,我下了决心,一定要有个结果和眉目。于是在发出稿件《史湘云是禄蠹吗》的同时,我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附上,意思是说: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,我今有疑,请老师开导之。我作为一个业余的红楼爱好者,写一篇万余字的文章是很不容

易的事，但写出来了寄出去了不见回音，使我很困惑。这里我给老师再寄一份稿件请阅，倘凌解放根本就不可能在红学论坛有所建树，请老师垂赐几字，我即不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，倘老师看我尚有一线之明，亦请先生告知几字，我便再在此更作努力。

这封信连稿子寄出一周左右，冯其庸先生的亲笔回信就到了。他写的信比我给他的信还要长。他说：解放同志，来信及稿件均已收阅，文章很好，显示出作者炼字炼句的功夫，结构也相当合理流畅，我已建议学刊发表。我意文章以坚实为好，其内如精金美玉，其外则富文采，读来犹如汉书下酒也，我已建议您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，盼能届时一见以慰渴想云云，一律细笔毛笔竖行书写，甚合我的古文阅读习惯。

我确实十分高兴。虽然冯先生自己的经历和学术成果在我心目中依旧茫然，但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：这是一位文豪，毛主席曾经赞赏过他，是一位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文人。能给你写这样一封亲笔信，是你有福。种种议论在我身边朋友中诵读，都是赞许冯先生的话，也有夸奖我的话，混在一处，很使我感慨激动。于是索性又写了几篇红学论文——今天的学界仍称其为“探佚学”的文章，不停地寄往北京，寄给冯先生，连冯先生的爱人夏老师和他的家人都知道了我，并说“这个人很能写”。

“很能写”是不敢当。然而当年刚近而立，心雄万夫的劲头和干活不怕累的体态支撑着我，又有冯先生这样的人称许和表彰，我如同写作癫狂了的人一样昼夜操作，写红楼论文，写随笔札记，查阅历史资料，一搞就是后半夜，朦胧睡醒便接着做。这是一生写作最勤最快最狂热的时期。实际上，这时我还不曾与冯先生有一面之缘。

1981年就这样过来了。待到了1982年10月底，第三

届全国《红楼梦》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。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,这年我三十七岁。真的如我原本分析的那样,来开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大学老师,很多是《红楼梦学刊》的作者。所意想不到的这些人似乎都很年轻,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老态毕现,说话言语诙谐便捷,一点儿学究气也没有,思维显得活跃灵动。冯其庸老师就坐在主席台上的中间位置一席——这是中国所有公共会场大家共同面对的规律。他是学会最高的领导。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。

会议的分组也是按大学所在地域分的,四川的、广东的、武汉的等等,这样会议管理会方便一些。可是还有不在大学中教书的人,比如我:南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——这个单位和职务在这样的会议上参会,怎么看都觉得“怪”。但分组下来,我还是去了我该去的组。各地来参会的新闻报道人员、刊物编辑和自由学术人大致都分了这个组。

我当然坐在台下,而且是自由选位。我选了一处靠通道边的位置,坐在主席团闭幕下台回宿舍的必经之路靠边坐下。一边审视打量冯其庸先生和其他老师,一边思索等会冯先生从这里经过,我该如何应对。

冯先生不似我想象那样随和,那样亲切和蔼。他端坐主持会议,无一苟且应酬之言,无一无缘一笑,也不交头接耳与人随便言语,“这是个热水瓶性格”,当时我便做出这样的结论。以后多少年与冯先生接触,和冯先生所做所为对照,我没有改变过作如是想:热水瓶一样的性格,激荡的精神,满腹的学问,充盈的智慧与热情,待人接物的亲切温馨都包容在他的严肃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外表之中,不深入接触,你是得不到的。

会议开幕式很快就结束了。在我的印象里,这里的会议气氛和南阳市委及单位会议的氛围不一样,人们发言很

热烈，学术气氛很浓，直话直说半点情面也不留。记得一位先生指摘另一位先生“你根本不是在研究脂批，你始终是在玩弄脂批！”这一类尖锐批评在我平常的会议中是根本听不到的。但这里的学人们似乎也只是听听，大家都很平静。待到中午会议结束，冯其庸和代表们一起离座开始退场，我立刻停止了一切想法，坐直了身子，等冯先生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便起身，鞠躬握手自我介绍。

“冯先生，我叫凌解放，来自河南南阳。”

“哦哦，好好！”冯其庸笑着和会上其他人招呼，一边对我说道“你来开会，很好！”

然后他又放低了嗓门说道“这里人多，白天人杂，这样——我就住在X楼XX房间，吃过晚饭你到我宿舍来，我们详细谈谈。”说完便随人流退出去了。

大约晚七时多一点的时分，我去X楼拜会冯先生。他那里有人正在谈话，我去便不言语坐在旁边听他们说学术谈曹学种种是非观点。谈到八时左右，人们便纷纷离去，冯先生便让我坐他的对面，他也没说什么寒暄的话，一开口就说“《红楼梦学刊》是全国唯一的红学学术刊物，你投稿很多，积极性很高，这是我们欢迎的。但你必须明白，全国的大学老师们共同维持这样一个刊物，不加节制连续刊载你的文章是不可能的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写一点红学论文，刊物可以适当载用，但更多文章要自行消化。比如写作内容集中于一点，刊出你的红学专著是比较合适的。”我忙说“我就是为这件事着急的，我是一名高中学生。在刊物界、新闻媒体编辑中一个稍为熟悉一点的也没有。写出文章给谁？谁用？我找哪个来为我出专著？”冯先生听了微笑“这件事我也想过，不须你自己费心，我来为你寻找出版社。”我所日思夜想无门可入的问题原来先生早有打算。如果能出专著，在出版社出书，何

必纠缠“学刊”不放？我当时一笑说“有先生这句话，我的心就放下了！我在出版社毫无根底，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出版朋友、编辑什么的对我稍加注目，写出的东西来无法处理，那还不是一堆废纸？”冯先生哈哈一笑说道“放心吧——我来处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”停顿了一下，他又问“你分组分在哪个大学区域？”我忙回答“我是南阳市委机关工作人员，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分在一个组。”冯先生点头说道“这就对了，这个组里编辑、记者和出版社负责人多，你正好在这里抽空可以多交流一点。你的文章我已阅读了不少，我认为选择一个合适方向，你搞文学创作的成功机会会大一些。你的文章文笔很好，是写作文学作品的手法，更适合这个门类。”这是一条重要信息，我当时立刻点头称是“我一定好好选择突破方向！”我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一句废话也没有，一句无用的应酬话也未说，匆匆来，匆匆退回宿舍。

这个杂乱的小组的讨论，基本上是不扯学术上的正事的。扯的都是社会传闻，某学者与某学者开始论战，谁和谁又言归于好，社会上电影界和电视界明星们出入碰撞之类。在我看来又新鲜又觉无用，谈论到第二天中午要散会时，有一位先生，他大概是哪个大学校务处的，在旁边说道“现在电视剧、小说都看不下去。康熙这个人八岁登基，十五岁庙谥运独智擒鳌拜，三次亲征准噶尔，六次南巡，帝王里头有几个人能和他比的？到现在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……”我就坐在他斜对面靠窗处，听了 he 这一段话好似拨开了我身边眼前一片浓雾：我正在寻找对象呢！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机会出来了？于是我大声接了上来，“这个题材小说，我来写！”众人乱纷纷的在旁说笑“你写，你写，我给你出书”《康熙大帝》的创作动议就是这样提出来的。

本来这是一件想都想不到的好事，我整天日思夜想的

就是有人肯于承担它的出版任务。现在这么多人一哄而起说给我出书，我理应兴奋激动。至少我应该询问一下大家的电话号码，这也是久久期待的事呀！可是没有去做。我被这个题目镇住了，我完全浸入在这个愉快里，其余该做的事忘得精光。

但这毕竟是我终身难忘的会议。不但跟着别的代表学到了新的红学知识，知道了红学会内部事业发展的规律，听到了冯先生对我还有对我的事业发展的想法和意见，还确立了自己创作的题目和方向，这些统统都是在会前想也没想象过的，而且我和冯先生的一些学生如张庆善、孙玉明等人都在会间熟悉，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

当然在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中，我又进入了文学界，由完全的不知名逐渐变成了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作协的委员、主席团委员。从职务的重要性而言，比红学会似乎还要高一点，整个河南省的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也只有我一人而已。尽管如此，我还认为我的根子扎在红学界。每当来京开会，无论党代会还是人代会，我都把中国红学会看成自己的娘家，中国作协呢？待我也很厚道，中国作协也是娘家，但是是我的后娘家。我每来北京见了张庆善诸人，坐在一起聊天谈掌故、说段子、谈故事等，如同最亲的兄弟，热烈且不加设防，有什么顺口即出，而和其他人在一块尽管很讲礼貌、很讲究朋友交情，但每动一言语，总要做准备“防着不要说错了”——这就是亲娘家与后娘家的区分。

这次会议之后，我又在贵州召开的红学会上当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理事。但这个时候我的主要力量已经放在了康熙身上：准备资料，收集康熙的有关民间传说；从清人笔记上阅读康熙年间的种种记载；在文化上多有一些准备；一边读，一边记录，一边整理，一边写。这应该感谢我有较好的古文水平，这些清代人写的文言笔记其实很好懂，有点

类似我们今人在阅读的时候的旧刊物、旧报纸那样,也很容易记忆和吸取。在阅读过程中,有心得或收获,也可随时记录下来,甚至写成短文在报纸上发表,我在当地一些团体和文界朋友中已经有了一些知名度。

大约在1985年初夏,五月份左右,冯先生到南阳来了。南阳本不在他计划日程之中,他是带着研究生到四川去的,中途在洛阳下了火车,南阳彼时没有火车站,冯先生坐公交车从洛阳到南阳,打电话告知了我,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大家应该能想象得到。我在南阳市委本就是负责外地文化人士来宛接待的,就是说:接待冯先生我连假也不用请,也不用告知哪位长官领导。我把冯先生师生两个安置在南阳军分区招待所,大致规划了一下他们在南阳的起居行程,便去见冯先生。

“你现在在干什么?”冯先生和我仍是无客气言语,他仍是他的热水瓶性格,无遮无掩直口直问。“这半年我一直在等你的稿子。可是连一篇也没有等到,也没有见到你有信来!”我赶快老实回答:“这半年忙着写稿子,我记着老师的话,没敢再给学刊发寄——我写了三种稿子,现在正是站在十字路口,老师来的正好,我正要请教您呢!”我请先生安坐,我谈了我写作的情况和规划,“我写三种稿子,一、红楼梦的论文,二、掇红集,三、《康熙大帝》写了一部分。”

“你的红学论文不用拿来了,我前一段已经读过了,我知道你的水准。”冯先生说道。“掇红集是什么意思,是与红楼有关的文章吗?”

我赶快回答:“掇红集是我自己的读书和搜集资料时的心理与心态,‘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’就是这个意思!”

“嗯,知道了。红学论文不用拿,掇红集我也不看,根据我的了解,你超越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的可能性也不会很

大——你把你的《康熙大帝》取来我看。”

《康熙大帝》当时已经写了十七万字的初稿。可是都是草稿，写得连勾带划，此转彼接，生人看生稿会很费劲，我囁嚅了良久才回答说：“我试试，连夜抄出十章给老师看，文字不好请冯先生原谅。”冯先生笑着说：“好吧，你抄一抄会好看一点的。”

就这样，我连夜抄了十章，整整齐齐送给先生。

冯先生似是一句废话也不曾有过。他立刻拍案表态：“你的什么掇红集，还有你什么红学论文都不要弄了，这样就好，这就是你的事业，写完后马上告诉我，我给你寻找出版社！”

冯先生在南阳连武侯祠也没有去，只是看了看张仲景祠堂，看了看汉画馆便匆匆离开了。我只有一句话，昼夜拼命干。除了康熙大帝，一切都放在了一边，一章连一章写、抄，天天如是，终始不倦创作，掇红集还有红学论文都放弃了。这样到年底，除夕夜华灯初放，街衢炮竹响起，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《夺宫》便写出来了，我对老伴说：我的书这就出来了，我们的命运要发生一些变化了。

命运确实发生了变化。但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愈变愈好，而是越变越复杂越糟糕。早在五月份，冯其庸离开南阳之后，就有朋友把我在写《康熙大帝》这本书的消息传递到了社会上，不但是《解放军报》报导了“转业干部凌解放写作《康熙大帝》”的短消息发表了出去，河南黄河出版社知道后派了几名同志来南阳看阅《康熙大帝》稿件，确定是否出版。

今天谈这件事很轻松。可是在当时，我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，知道这个消息等于油锅里扔进去了一块大石头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当时的部长是个小心眼，开始在部里给我难堪，开会时不指名的批评：“有些同志不务正业，上

班带孩子,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稿子。”出版社来人,我去找他请假,他竟说“你要知道,一旦出书,你一个人一下子就是几千元稿费,这是一个叫人眼热心动的数字啊。”

确实是这样,当时我们那里不单是南阳市,即使在全省,建国以来也不曾有过一个长篇小说出版,确实让人眩目。挣多少稿费我不知道,但那肯定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谁也不曾得到过的报酬!这是在出版社社长和我的责任编辑第一次来宛,我去请假时,他当面说的话。我当时心里很不愉快:本来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来到南阳从来都是我出面去应对去接待,我根本不用给你请假,自己就有权处理,只是这件事主在我,我才来找你,这和你所说的那些稿费什么的有什么关联?在这种情况下,我对部长说“也就是这回事,我来请示一下,你如果见他们,我就安排;你如不见,我就单独处理单独接待了。”说完我就去了。我和部长的矛盾公开化了。恰恰这个时期,《中国青年报》接到举报说:南阳卧龙岗管理不善,报纸要公开批评,派“小辣椒”来宛调查。部委会一个决定:派凌解放先去卧龙岗摸底!我知道他们什么意思,我应没有做错什么事,是他们有人想整我,送我到“不测之地”。苦恼间我把情况汇报给了冯其庸先生。先生倒也没说什么,只是在三五天里给我的回信是一副大大的对联:

浊浪排空君莫怕
老夫见惯海潮生

这个危急情况就硬扛过去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挥着刀打上阵来举刀要杀人,可是《中国青年报》最终批评的是部里的领导。没等多久,我随省文联会议到鸡公山。从山上回来,小说清样已经到手了。就这样《康熙大帝》的第一卷

《夺宫》就出版了。

冯其庸先生当然是头一位看到书的人。虽然寻找出版社的事，我没拜托他，但是我还是认为冯先生是这本书的导师。他看到样书很快就来信表示祝贺，并且问我打算这部康熙写几本，我当即电话报告“写上、中、下三本”。

“那怎么能行呢，康熙这本书最少要四本！”

“好的，先生，我再调整一下，写出四本来。”

“书中的伍次友处理得很好”，冯先生换了话题说道：“但我不理解你的安排意图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这个题难答。我就是再说一车话也未必说得清楚，于是便在电话中委婉回答：“他们的结果是我仔细想过的，学生不敢乱加臆造。”冯先生也就不再追问了。

1986年初夏，黄河出版社在郑州举办了《康熙大帝》一书的文学座谈会，来参加会议的除了河南省作协的一些朋友，省外、北京来的朋友仅仅冯其庸先生一人而已。

（本文作者：河南省南阳市文联，邮编：473000）